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柯灵卷

早熟的悲欢

文字生涯第一步

心的跳舞

十里洋场

不夜城

苏州拾梦记

遥寄张爱玲

文酒风流二千年



华文出版社



C33
52
10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DH86/23

柯

灵

卷

柯灵 著
唐文一 编

华文出版社

Y1800: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:柯灵卷/柯灵著;唐文一编.

-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8.10

ISBN 7-5075-0746-7

I.东…

II.①柯… ②唐…

III.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②柯灵-文集

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5400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电话 (010)63096781 (010)66063891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密 云 胶 印 厂 印 刷

北京京鲁排印部照排(63044503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25 印张 292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 册

定价 19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分 自传·自述

- 3 我的童年
- 6 早熟的悲欢
- 9 文字生涯第一步
- 16 银幕旧闻拾遗
- 24 《周报》沧桑录
- 47 回看血泪相和流
- 56 神奇的时间

第二部分 小说·剧本

- 61 心的跳舞
- 67 同伴
- 84 云
- 96 湮

- 117 舍
130 浮世画
145 霍去非
161 十里洋场
182 夜店
243 不夜城

第三部分 散文·游记

- 313 野渡
316 苏州拾梦记
321 逆旅
324 桐庐行
327 阿根廷纪游
356 如果上海写自传
359 遥寄张爱玲
368 画意绵绵
374 小浪花
378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碑文
379 文洒风流二千年

第一部分 自传·自述

我的童年

我有许多缺点，其一是数学低能。小小一个数字，最简单的加和减，可以算老半天，还算不清楚。有一次要算一笔帐，是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元几角几分，除去一万还剩多少。那成串的阿拉伯字骇住了我，我想，太艰深了，不行，赶快请教旁边一位学会计的朋友。他愣了一愣：“怎么，这还算不出来？”我呆呆地看着，听他说：“除了一万，不还有几千几百几十几？”叫他这一说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可不是吗，太容易了！我怎么还算不出来？

不懂数学使我吃了大亏。我没有科学头脑，不能条分缕析，有计划地做事，大概跟这个缺点有关。但像前面这样简单的算法，我还不至于算不出来，为什么一笨至此呢？考察原因，只是因为懒得用心。仗着自己不会算，索性对阿拉伯字存心别扭，没看见它们，先抱了“敬而远之”的态度。原来犯的正是自暴自弃的毛病。

这病根还真深，是从小种下了的。在小学校里我就不喜欢算术，平常敷衍了事，考试起来，一狠心就交它个白卷。跟一般少年一样，我有强烈的好胜心，可是对这一门自愿认输，而且处之恹然。如今纵然想“老牛爬墙”，不用想再爬上去了。

我小时候最出色的功课是图画，老师赞许，同学羡慕，自己也颇得意。当时对绘画的兴致也真浓，到处观摩，到处学习。乡僻处不容易找到画谱，香烟里的“洋片”成了我最宝爱的恩物。有一种“洋片”，专画风景，这小纸片上的云树山川，曾使我反反复复作醉心的神游。二十几年了，透过辽远的岁月，无数人事的压积，在我衰退的记忆里，

还鲜明地印着这些画幅：题作《夕阳返照》的是，平远的秋林，灼灼的晚霞，临水人家，一个村姑临流浣衣，双手插在水里，夕阳照得她满脸通红。题着《渔村夜月》的是，天连水，水连天，天上一轮圆月，水滨一个小小人影，扳起一张四角玲珑的大网。《欸乃一声山水绿》，一江春水，一痕远山，扶疏的树影下有一叶扁舟，舟子正悠然打桨，仿佛桨声里也荡漾着绿意……

如果家里能培植我，或者我自己能够潜修苦练，我想我是很可能成为一个画家的。并不是说我有这种才分，给我自信的是兴趣，兴趣是一切事业的始基。

可惜后来我的兴趣转到了看“小说书”一方面。我还记得，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同学，他灵活的口才引我打开教科书以外的书本。第一部是《西游记》。生字真多，词句更多不能了然。我的办法是，看见生字就跳过去，丢开不管，或者自作主张替它假定音义，这在我们那时候的术语叫做“杀强盗”；整句不懂的就打哑谜。情形苦得很。但慢慢的终于看出了味道，虽然眼睛害着病，见光就睁不开，还在摇晃的烛影里看得津津有味。

这以后，书本成了我的密友，不断地看，大都是旧小说，更多的是武侠小说，文言的也看，一一初看起来真吃力，渐渐地也就习惯了。看见书，就像遇见熟人，忍不住拿起来翻弄翻弄。后来慢慢从旧书看到新书和杂志，《少年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，然后是《洪水》、《小说月报》……从虚幻到现实，从万花缭乱的惊奇故事到有血有肉的人生，我似乎忽然懂事了許多，一个人坐在静静的院落里，捧着一本书，为它的悲欢离合笑着，流着眼泪，似乎全生命都浸到了书本里。现在想来，那种快乐的沉醉是多么动人，可是这种情景远了，远了，永远不回来了。

我是少年失学者，今天能靠一枝笔生活，而且不仅生活，而且也自以为用笔做了一点多少有益于人的工作，追究因缘，应当感谢那些书本。我就这样开始看的书，接着看报，把报纸副刊上爱读的文章细磨细琢地抄下来。学着思索，学着自己动手写。

弄文艺不能孤单单的舞文弄墨，应该什么都懂一点。但等我明白这道理的时候，晚了。这从小养成的狭窄的兴趣成全了我，也苦了我。真是“老大徒伤悲”，纵然我有野心再进修一点别的什么学问，生活环境不允许了。例如数学，即使最简单的，我也只好安心做笨蛋，为的是没有兴趣。陶行知先生说：“做到老，学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。”学问本如烟海，年龄当然限制不了人的努力，可是做学问的兴趣能从小养成，轻车熟道，到底方便得多。

有一个故事：一位贵妇人跑去看一位著名的教育家，诚诚恳恳请教她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育。教育家问：“你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出世呢？”妇人笑道：“早出世了，已经一岁多了。”教育家说：“快回去，你已经晚了一年多。现在就开始，也许还来得及。”

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什么都得从小来。少年人自以为来日方长，不妨等将来再说。可是等到将来，就什么都晚了，来不及了。

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

早熟的悲欢

大概因为老了，又不时信笔涂鸦，就常有人问起我的“处女作”是什么。我感到很难作答，因为我没有那种可以认真地称之为“处女作”的东西。但浮沉文海，冷暖自知，说一点蹒跚起步时的琐琐凡情，博读者闲中一笑，那自然是可以的。

我走上文学道路是偶然的事。小时了了，就“胸怀大志”，发愤要当作家那样的念头，我从来也没有过。我的学历表略高于文盲的一档，在理应继续求学的年龄，却被迫“好为人师”，当了小学教员。这就免不了自误误人，举步艰难。为了勉力应付，只好一面教人，一面自学。所谓“自学”，唯一的途径也就是暗中摸索，胡乱地找书来读，有如饥不择食，慌不择路。在小学时代，我已开始读“闲书”，读的主要是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七侠五义》之类，目的是为了好玩，满足好奇心。我执教的小学在我家邻村，那时的农村是真正的文化沙漠，会把人的心灵渴死的。可怕的是大家并不感到这一点，因为肉身的饥渴更重要。我碰上难得的幸运，有机会零星地读到少量上海出版的杂志，纸上的大千世界打开了我的眼界，使我着了迷。久而久之，也就自然而然地萌生了写作冲动。厨川白村认为文学是由于生命力受压抑而产生的，是“苦闷的象征”，我相信这个话不无道理。现在回想，我开始接触文学，迷恋文学，肯定和我寂寞而骚动不安的灵魂有关。

我的第一篇习作，题目大概是《斗门提灯会记》。我的故乡是浙江绍兴斗门镇，约在一九二四年国庆节，为了表示庆祝，举行了一次提灯会，宛若游龙的灯火给了我灵感。那是用文言写的记事文，发表

在《越铎日报》上。这张报纸因为鲁迅写过文章而著名,但此时早已和鲁迅无关,只是一张内地县城普通的日报。《提灯会记》的文字,至多也只达到通顺的水平。但自己手写的东西,连同自己的姓名(那时我还根本没有“笔名”这一观念),第一次变成印刷品在报纸上登出来,对一个刚满十五足岁的孩子来说,却不是一件平常事。我为此如醉如痴,飘飘欲仙了好些日子。这种难以形容的喜悦,我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。

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无形中给了我勇气,给了我兴致,这二者恰恰是生存的酵母。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给了我这种力量的编辑是谁。我从此除了不断在县城的报纸上写作,还转向上海出版的《儿童世界》、《少年杂志》投稿。令人闷损的是我不能经常看得这种刊物,投稿像打哑谜,是否打中了很难知道。我曾根据民间传说,写过一篇呆女婿的故事,投给《儿童世界》。寄出以后,就此杳如黄鹤,我也早已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大约过了一年多,我难得进城,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就地摆设的旧书摊,横七竖八的过期杂志,活像一批过时的头面人物,懒洋洋地在门庭冷落中追溯旧日的荣华。我不觉停步,蹲下身去,翻看了几本《儿童世界》,不想忽地眼前一亮,我笔下的呆女婿竟赫然出现,还配了插图。天可怜见!这戏剧性奇遇给我的惊喜,恐怕只有母亲忽然找到失散已久的儿女才能相比。

我在《少年杂志》的投稿,更如石沉大海,我也慢慢地忘了个一千二净。直到二十年后,抗日战争末期,我已经流寓上海,有一次去访钱钟书、杨绛伉俪闲谈,钟书忽然拿出一本书《少年杂志》,指着其中的一篇《仁术》,含笑相问,这是不是我写的?这意外的遇合,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偶然在路上捡到了遗失多年的旧物,虽然未免有情,却也没有那种恍如梦寐的意味了。

我尝试投稿的年代,似乎还没有正规的稿酬制度,我只记得从《少年杂志》得到过两张书券,价值在二三元之谱,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办的,可以用书券买本版图书或订阅杂志。据杰克·伦敦的传记,这位报童出身的美国作家,曾用稿费造起美轮美奂的别墅。我那时实

际还是孩子，见少识浅，一纸轻飘飘风也吹得起的书券，到了我手里，也像贫儿暴富似的高兴。我生平购买书刊的历史，第一个豪举就是用书券订了一年的《妇女杂志》。为什么是《妇女杂志》而不是别的呢？并非我觉悟特别高，还未成年就关心妇女解放，而是因为我能够看到的刊物，只是寥寥可数的三五种。

成为《妇女杂志》的长期读者以后，也就自然地成为投稿者。有一次编辑部以“可怜的寡妇”命题征文，我写了一篇《织布的妇人》应征，在一九二六年某期的杂志上发表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用幼稚的目光注视中国妇女的不幸命运，大概和我母亲的遭遇有关，虽然我那时还不能真正理解她的痛苦。这篇东西是用韵文写的，一韵到底，约百余韵，大概可以算作叙事诗——如果不嫌过甚其辞的话，因为押韵并不就是诗。这是我在以成人读者为对象的全国性杂志上第一次披露的作品，后来又收在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《柯灵选集》里，一般都把它当作我的“处女作”，其实只是我一系列习作中的一篇。

我想，“处女作”的含义，重点不在“处女”而在“作”，就是说，本身得是较为像样的作品。“处女”只对中国的封建头脑有特别的重要性，以作品而论，光凭“处女”，并没有多少价值，只是对作者本人不无意义。我写得太早了，世路风云，人生修养，艺术根基，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动起手来。那时候我完全是个知识的赤贫户，只好“赤手空拳，迎接命运的挑战”。不过这些描红本上的墨迹，也自包孕着我一去不返的少年情怀，读者也许不难从我这些迢迢零落的记忆中，分尝一点早熟的快乐与酸辛。

一九八八年六月，于上海

文字生涯第一步

生活很像连环套，一环一环，互相牵引。

我尝试投稿，始于一九二五——一九二六年间，第一个落脚点是故乡绍兴的《越铎日报》副刊。那时我是个小学教师，有些学生长得比我高，农民背后管我叫“小先生”。第一次大革命以后，《越铎》改为《民国日报》，我继续投稿。那是我自学写作过程中的“描红”阶段，但我后来的生活道路，却有深远的影响。

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，在乡间属于缙绅阶级一流人物，曾在上海大东书局短期工作过——我估计他不在编辑部门。乡居无聊，一九三〇年春节刚过，他忽发奇想，决定到上海办一种《时事周刊》。他极度简单化的想法是：上海报纸很多，篇幅浩繁，大都市节奏紧张，人没有时间遍读，如果办一份周刊，摘要汇编七天内的新闻，就可以满足读者的需要。他自己是不读报的，因此会有这种想法。而这种似乎有理的皮相观察，正好表明他对社会脉搏的钝感。世界历史进程的规律是交通日益便捷，信息日益灵敏，人类相互关系日益密切，而他的想法正好背道而驰：回到“断烂朝报”的时代去。那时我不出乡关一步，当然比他还要无知。他还有一种仿佛非常切合实际的想法，因为他当过小学校长，当时小学校里每周要举行一次“纪念周”，按照规定仪式，要由校长领读孙中山先生的“总理遗嘱”，还要报告时事。后者大概曾使他很感烦恼。照他设想，有了《时事周刊》，就可以照本宣科，便利非凡。如果全国小学各订一份，销路就可操左券，看来前途大有可为。

就是因为我常在报上投稿,老师“慧眼识英雄”,要我到上海来协助他实现美妙的宏图。我受宠若惊,自然唯命是从。他还随身带了个本乡的农民来烧饭打杂,供他差遣。我们一行三人,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一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,在报摊上订了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作资料,他亲自出马,联系了一家印刷厂,一个报贩的小头脑,这就算万事齐备,可以着手创业了。这个刊物究竟怎么编,怎么让上海社会知道有这么个独特的刊物,他似乎连想也没有想过。他派给我的任务是从报上剪辑新闻,再写几则短评。编、写、校对、跑印刷所,全权负责。古人说“杀鸡焉用牛刀”,老师就凭我这个初到上海的无名小卒,一个乡下的小知识分子,居然鸡刀宰牛,轻而易举地把《时事周刊》办了起来:三十二开,三十二页,外加封面封底,很像个正规的印刷品(说来很滑稽,封面题签也是我手书的美术字)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们老坐在报摊上吃灰尘,没有读者光顾。出了五六期,就太平平地寿终正寝,在春申江上汪洋如海的出版物和读者群中,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。其实,只要我们对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点点常识,一点点正常头脑,再加上一点点自知之明,早就应该知道这完全是多此一举。

我的老师是瘾君子,这计划想必是他在吞云吐雾时冒出来的一个幻想,现在破灭了,但并不甘心,他看到上海小报盛行,决定改办一张小报。这一回却是胸无大志,再没有什么高尚的理想,只盼望牛刀小试,能够图点小利了。一般小报都是四开的日报,我们却别开生面,是八开的三日刊,原因大概是为了“节制资本”。他也不调查研究一下,上海这类烟花丛中的小报,办报的,读报的,都是何等样人;也不想一想,我这个乡下少年,能不能编这种报纸,依然派我独支大厦,一个人包写、包编、包校。结果可想而知——只出了四五期。现在想想,我简直禁不住佩服自己,当时怎么能够胡诌出那么些文字来填满篇幅的。这张小报的名称、内容,我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,忘记得干干净净,只有一件事还留有点印象:大概就在那时候,正好发生了洪深抗议罗克主演的美国辱华片《不怕死》事件,一点小小的爱国心驱

使我在小小报上表示了对洪深的支持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电影发表意见，但洪深先生当然决不会看到这张稀有的小报的。

老师这才意兴阑珊，不想东山再起。他当然损失了一些资金，但依然能够雍容自在地出入于大世界一带的燕子窠里，乐不思蜀。过足了烟瘾之后，也还经常发表一些独具只眼的见解。例如在小餐馆里吃夹心面包，因为菜单上写的是“三明治”，他不知道这是洋泾浜英语(Sandwich)的粤语音译，就说应该改成“三民治”才对，以表示他是三民主义的信徒。他并不慨叹自己雄图的失败，却终于看出了我的低能，因此很有点对我责怪怨尤起来。我的低能当然是事实，我决没有替自己辩护的意思。绍兴富家雇佣贫家少女当帮佣，照例只供食宿，不给工资，通称“白吃饭”。我这个包办一切的主编主笔，原也只是“白吃饭”之流，连来往的川资也是自掏腰包的。起先我还认定这是老师对我的栽培，一直心怀感激。到了此时，也就不由得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。

生活里常有些阴差阳错的事，正当我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却又由于幸运的误会，忽然出现柳暗花明的一境。

原来绍兴县教育局的督学田锡安，是颇有些理想和见解的教育家。一九二八年，我在故乡农村当小学校长的时候，他来学校视察，后来给这个小学颁发了“办理优良”的奖状。当时全县只有两校受表扬，我所在的学校荣居其一。这时他正在绍兴筹备创办一张专供小学生阅读的报纸，就是因为过去这点因缘，又听说我在上海编刊物，却不知道我正兵败垓下，狼狈不堪，误以为我有些编辑才能，就写信劝我为桑梓效力，回绍兴帮他办报纸，这才把我从这十里洋场上拉出了陷阱。

田锡安主办的是《儿童时报》，先是在绍兴出版，一年后搬到杭州，影响较为扩大了，改称《中国儿童时报》，以标示这是全国性的报纸。根据田锡安的理论，以为要替国家作育英才，应当在儿童时代就灌输时事教育，使他们打开眼界，宏观宇宙，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。我想即使在今天，也应该承认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主意。田锡安精明能干，《儿童时报》创办伊始，他首先揭橥主张，向全县乃至浙江全

省小学征求订户,从筹集资金着手,按部就班,有条不紊。一九三〇年夏,报纸创刊了:小报式的四开报纸,三日刊。第一二版是“国内新闻”、“国际新闻”、“儿童新闻”,配上一篇通俗易懂的短评。新闻从全国性的大报(主要是上海的大报)取材,因为当时新闻报道用的都是文言,须一律译成白话,综合改编,以适应儿童的理解力。“儿童新闻”取材不限于报纸,也从有关的杂志上采撷。第三版是文艺栏,发表故事、童话、诗歌之类,属于怡情悦性的东西。第四版开辟了“儿童园地”,专门容纳小读者的投稿。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编辑、写作、改译、校对,也还是由我一手包办。除了第四版,基本上全是我的手笔。还得兼管发行。另外也只请了一个年轻的工友,办理杂务。人员编制,和《时事周刊》一样:三对三。但《时事周刊》只是一出时代错误造成的悲喜剧,我的老师仿佛是一位变种的微型堂·吉珂德,我就是他忠实的侍从桑乔·潘萨,那位农民雇工,委屈点,只好算那匹伶仃的瘦马。《儿童时报》却是一位教育家富有理想的创造性实验,我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愉快地工作,还有相当不差的工资待遇,是个正经办事业的样子。前后相比,情形大不相同了。在我迄今为止的社会经历中,编辑报刊占很大的比重,后来逐渐积累了经验,懂得多一些了,有的刊物也发生过较大的影响。饮水思源,《儿童时报》可以算是个起点。但我还是应该感谢那位老师,他实际上给了我一个见习编辑的机会。正是在那时,我第一次接触排字架和印刷机,第一次闻到油墨的香味。

编辑工作本身是一种艺术,在高明的编辑手下,是具有极大魅力的创作。编《儿童时报》时,我初出茅庐,能力有限,更限于物质条件,无论内容形式,都只能做到因陋就简。但人在年轻时,也真是精力旺盛,我一手包办《儿童时报》之外,居然还有余绪写些别的东西。投稿范围扩大到了浙江省一级的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。我早期的散文《龙山杂记》,就是那时留下的雪泥鸿爪。回想起来,我那时也并没有一心想当作家的意思,只觉得内心有什么要倾吐,只是想写,像着了迷一样。一九三一年,“九一八”事件爆发时,报社已移到杭州,心里一激